

哈尔滨地方志史料丛书

哈 尔 滨 人 物

第 三 辑

哈尔滨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编

主 编：郭 显 祥

副 主 编：宋 红 军

责任编辑：杨 克 炎

编者的话

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反映城市，必然要反映城市中从事各项活动、促进或阻碍城市发展的人，特别是城市各个阶层、各个方面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因此，人物志是城市志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份。

为了进一步探索志书中人物传的撰写方法，广泛征求各个方面对入志人物的意见，尽量避免志书编纂过程中出现疏漏和成书后的遗憾，继《哈尔滨人物》第一、二辑后，我们从所征集到的哈尔滨市各历史时期、各个方面有代表性的人物名单中，又筛选出40人，编辑成《哈尔滨人物》第三辑。本辑收录的人物，均为已故人物。其中以正面人物为主，亦收入部分反面人物；以人物在哈尔滨的业绩、影响为主要选择依据，不考虑其级别、籍贯；适当注意了历史时期及各方面人物的比例；人物次序以生年先后排列，同年以月份为序，外国籍人物置最末。

本辑人物的撰写，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不虚美，不隐恶，对人物的评价力求客观准确，以获得较强的史料价值，为基层志办撰写人物提供借鉴，为编写《哈尔滨市志·人物志》奠定基础。由于工作的基础及水平的局限，愿望与实际之间肯定存在较大差距，恳切地希望领导、专家、修志同行和广大读者不吝批评指正，以期质量逐步提高。

1992年10月

目 录

编者的话

张景惠	(1)
朱庆澜	(4)
邵乾一	(8)
荣孟枚	(12)
王静斋	(15)
莫德惠	(18)
张复生	(22)
刘 瀚	(26)
李毓麟	(30)
何庆山	(33)
刘 忠	(36)
穆景周	(40)
武胡景	(44)
陈为人	(48)
王 铸	(53)
杨靖宇	(56)
侯 志	(60)
高仲山	(64)
鞠成椿	(66)
王学尧	(68)

王铭绅	(72)
王殿钺	(75)
沈从龙	(79)
杨銜晋	(82)
关宏达	(85)
赵士魁	(83)
信 风	(82)
娄焕明	(96)
邵越千	(98)
李芸春	(101)
张清沔	(104)
李克异	(107)
杨 菊	(110)
田继陈	(115)
于凌武	(118)
郑绪增	(121)
史业英	(125)
蒋佩奇	(129)
万斯白	(132)
沃斯特罗乌莫夫	(134)

张景惠

张景惠（1871—1956），字叙五，辽宁省台安县人。农民家庭出身。父亲曾在村中开设豆腐房，张景惠少年时即会做豆腐。其父死后，一度与胞兄以卖豆腐为生，故后来有“豆腐匠总理”之称。

青年时代的张景惠游手好闲，嗜赌成性，专门结交地痞流氓、赌徒恶少，养成了好逸恶劳、善于交游的习性。1900年庚子之变，沙俄趁机出兵东三省，到处烧杀劫掠，张景惠借口保卫家乡安全和商旅通行，组织武装，取名“保险队”，自任队长，按地亩抽饷，干起了职业保安行当。

此后，张景惠交游更广，名声也越来越大，不仅一些无业游民纷纷投靠，就连当时几乎无人不晓的江洋大盗、绿林悍匪也成了他的座上客。其中，黑山县土匪头子张作霖与张景惠关系最为密切。1901年，二张将所部合并，以壮声势。张景惠人多势大，但他执意让出大头领一职，自己甘居二头领，因而被张作霖视为知己。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正在奉天讲武堂受训的张景惠，探知驻奉天西下洼子陆军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有举兵响应革命、驱逐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之意，遂秘告驻防郑家屯的张作霖。张作霖立即率所部骑兵日夜兼程，入卫奉天。结果不仅使蓝天蔚的革命计划化为泡影，反而使清朝余孽赵尔巽借助张作霖武力当上了民国的奉天都督。赵尔巽则向窃居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保举张作霖任奉天陆军第二十七师师长，张景惠就任该师独立炮团团长。

1915年，张作霖掌管了奉天省军政大权。张作霖随即升任张景惠为第53旅旅长。其后张景惠扶摇直上，获得了奉军副司令、察哈尔都统兼陆军第十六师师长的头衔，并代表张作霖长驻北京。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张景惠因长驻北京时与直系首领吴佩孚过从甚密，不愿与之为敌，二张由此萌生不睦。直至1925年冬，张景惠老母病故，张作霖经吴俊升等说情，才准许一直寓居北京的张景惠回原籍奔丧。二人重归于好。1926年，张作霖拥兵入京，自任大元帅，组织安国军政府，任命张景惠为陆军总长，未几，改任实业总长。

1928年6月，张作霖返奉，途中于皇姑屯遭日军暗算身亡。张景惠同车挨炸，但伤势不重，月余即愈。7月2日，张学良出任东三省保安司令，委任张景惠为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11月19日，张景惠走马上任，抵达哈尔滨。

张景惠主政哈尔滨和东省特别区3年，干过几件好事，如下令废止公娼、规定特别区内商业一律改用中国度量衡等。但反苏反共始终是他的政治信条，震惊中外的“中东路事件”就发生在他的任期内。

1929年1月初，张景惠上任伊始，就指使特别区警察总管理处查封了哈尔滨苏联职工联合会，接着以“私自开会，任意宣传赤化”为名，逮捕其会长及9名办事人员。不久，又查封了哈尔滨苏联国营远东林业公司。同年5月27日，张景惠接到一份“本日下午哈尔滨苏联领事馆地下室将召开第三国际共产宣传大会”的密报，遂以“俄人宣传赤化，显违奉俄协定”为由，令警察总管理处“速派干警驰往搜查”。下午2时，警察总管理处第三署100余警察，突然闯入哈尔滨

苏联领事馆，将前来开会的中东铁路沿线各段、哈尔滨总工厂、机务段各职工联合会及苏联商船局、远东国营贸易局等负责人共计39人逮捕。29日，张景惠下令封闭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绥芬河等地的苏联领事馆。

东北当局在南京政府授意下，武力接管中东铁路，逮捕苏联人员200余名，导致中苏关系破裂，东部边界地区发生武装冲突。从8月至11月，苏军与东北军多次接战，东北军惨遭失败。12月22日，双方签订《伯力协定》，决定“恢复冲突以前之状态”，“中东路事件”始告平息。

1931年，张景惠回沈阳私宅小住，适逢“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抢掠了沈阳市内张学良、张作相等人的私宅，唯独未动张景惠住宅，反而派兵保护。9月22日，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亲赴张景惠私宅密访，策动他速回哈尔滨，宣布“独立”。张景惠受宠若惊，表示回哈后一定竭力维持哈市治安，保证日本侨民生命及财产安全；9月23日，张景惠在日军代表陪同下离沈返哈，从日本驻哈尔滨领事馆领取了3000支枪和40万发子弹。9月27日，张景惠在哈尔滨宣布成立“东省特别区治安维持会”，自任会长；两天后，又宣布招募成立2000人的伪特别区警备队，为策应日军进占哈尔滨做准备。

1932年1月1日，张景惠公开投敌，宣布就任黑龙江省省长，于哈尔滨发表黑龙江省“独立”宣言，解散地方“维持会”。

1932年2月16日，张景惠秉承日军旨意，以原东北政务委员会名义，公开出面召集熙洽、臧式毅、马占山等到沈阳开会，讨论“建国方案”，此即所谓“四巨头会议”。次

日，新拼凑的伪东北行政委员会在沈阳成立，张景惠出任委员长。3月1日，宣告伪满洲国成立，张景惠被傀儡政权任命为伪参议府议长兼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同年8月又被任命为伪满洲国军政部总长，次年授陆军上将衔。1935年5月接任伪国务总理大臣。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张景惠以伪国务总理大臣名义发表声明，声称基于“日满共同防卫之大惠”，支持日本侵华战争，继续死心塌地为日本侵略者效劳。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夕，张景惠随伪满皇帝溥仪逃离长春，在通化主持最后一次重臣会议，安排溥仪退位和解散伪满洲国。后又匆匆返回长春，拼凑“东北地方暂时治安维持会”，准备迎接蒋介石前来接收。8月20日，苏军在东北抗联配合下进驻长春，实行军管。张景惠于8月25日被苏军逮捕，随即被押往苏联境内的伯力收容所，1950年移入抚顺战犯管理所，1956年死于狱中。

(宿凤林)

朱 庆 澜

朱庆澜(1874—1941)，字子桥，祖籍浙江绍兴，出生于山东济南。自幼家贫，5岁丧父，14岁丧母。1893年出关投军在盛京将军赵尔巽的奉天巡防营。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后，随军赴登州海防，经奉天府尹奏调，先后在奉天、凤凰、安东等厅县任知事。后逐步擢升，官至协统。清末，

随赵尔巽移镇巴蜀，任四川巡警道。1910年，升任陆军第十七镇统制。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朱庆澜举兵响应，被公众推举为四川大汉军政府副都督。中华民国成立后，袁世凯将其调到北京，任总统府高级军事顾问，授陆军中将衔。

1913年，朱庆澜出任黑龙江省护军使兼署民政长，1914年后改任镇安右将军督理黑龙江军务兼巡按使，不久又兼任滨黑铁路督办。

朱庆澜主政黑龙江两年有余，政绩不凡。他着力编练警团，举办清乡，使社会治安有明显好转。他始终力主移民实边，发展农业生产，多次组织勘测荒地，大兴垦殖。1914年曾飭令黑龙江沿岸库玛尔、毕拉尔两路鄂伦春人择地拓垦，由省拨给车犁牛马，并拨付羌洋2000元，以示“抚绥”。他还决策开辟嫩漠公路，接收松黑航运，改善了交通条件；还曾创办女子教养院，提倡男女平等。他十分重视边防建设，尤其对沙俄的侵略扩张有清醒认识。1914年，他曾上书北洋政府，痛陈切不可再听任沙俄攫取在华筑路、开矿、伐木等特权。

朱庆澜督黑期间，为政清廉，颇受时人好评，称其“来时一肩行李，去时两袖清风”。他只身赴任，不携眷属，个人生活简朴，从不奢侈享乐，终年身着军装，常于夜间单人出巡。有一次，他深夜私访归来，被不认得他的门卫挡在门外，幸为卫士长发现，才被放行。事后，朱庆澜不仅没有责怪这个卫兵，反而奖给他小洋50元。

1919年5月，朱庆澜出任段祺瑞政府的广东省省长。1917年张勋复辟，朱庆澜立即通电声讨。同年，段祺瑞废弃

《临时约法》，朱庆澜坚决支持孙中山发起护法运动，遣责段祺瑞的倒行逆施。

1922年10月，朱庆澜应张作霖之邀，重返东北，出任中东铁路护路军总司令，统辖黑龙江、吉林两省护路军。同年11月，兼任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驻哈尔滨。此时正是中苏复交谈判的前夕，中东铁路问题成为关系中国、苏俄以及美、日、英、法、意等国利益的敏感的国际问题。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下，朱庆澜奉命履行其职，其中既有坚决维护国家主权的正义之举，也有诸如查禁“过激宣传”等维护封建统治的举动。

1923年7月，朱庆澜以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名义出示布告，宣布撤销白俄分子把持下的中东铁路管理局地亩处，设立东省特别区地亩管理局接管其事务，地亩处“旧有俄员”一律受特别区地亩管理局“差委”。由于这一举动不利于美、英、法、日等国利用白俄分子反苏的政策，故引起这些国家驻哈尔滨领事的不满和“抗议”。美国驻华公使舒尔曼曾亲来哈尔滨，攻击朱庆澜收回地亩处是“野蛮举动”，要求立即“恢复原状”。但朱庆澜此举受到哈尔滨各界人士的支持，北京政府外交部也于同年8月驳复驻京各国公使，重申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公署接收中东铁路管理局地亩处纯属中国内政。

朱庆澜为维护国家主权，对大批拥入中国境内的白俄分子及其破坏中国主权的活动采取了防范措施。曾成批解除退入中国境内的白军武装，遣送回国；曾查封设在哈尔滨的俄国帝制联合会及其会报《俄国之光明》；查封白俄首领、前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霍尔瓦特建在哈尔滨市香坊地区的别

墅；逮捕中东铁路前负责人、白俄分子沃斯特罗乌莫夫、别哈依洛夫，支持哈尔滨市公众要求驱逐一贯敌视中国人民的中东铁路管理局地亩处处长关达基的运动。朱庆澜对建立新国家的苏联人民却充满同情，当苏联远东地区遭受严重饥荒时，朱庆澜立即发起成立“俄国灾荒赈济会”，号召东省特别区民众捐款献粮，援助苏联灾民，并反复强调苏联人“皆我人类，助人水火，义不容辞”。在朱庆澜的号召下，哈尔滨及黑龙江省各县绅商纷纷解囊相助，共筹集300车皮粮食运到苏联赤塔，缓解了苏联远东地区的灾情。

1925年2月，朱庆澜决定辞去一切军政要职，脱离仕途，不再为官，以全力从事社会救济和慈善事业。1927年，山东、河南两省久旱成灾，朱庆澜奔走于东三省和平、津等地，募款180万元，全部购粮，散发灾民。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正在上海从事长江水灾难民赈济工作的朱庆澜立即联络在沪社会名流，致电蒋介石，敦促政府一致对外。1932年5月，朱庆澜在北平发起成立“辽吉黑热抗日后援会”，被推为会长。此后，朱庆澜致力于“后援会”的工作，四处讲演，多方宣传，从海内外筹集到大批款项，有力地支援了东北、华北各地的抗日武装。“后援会”的活动很快遭到了国民党反动分子的敌视与破坏，他们诬告朱庆澜“中饱私囊”，到处散布“后援会”帐目不清的流言。后经有关部门立案清查4个月，方澄清事实。朱庆澜遭此打击后，积郁成疾。

1935年，朱庆澜经冯玉祥举荐，出任中央赈务委员会委员长。1937年“七七”事变后，朱庆澜除致力赈务外，还在安置难民、规划垦区、组织垦殖、生产自救方面做了大量工

作，受到社会各界赞誉。然而他的身体也因过度劳累而渐趋不支，1941年1月病逝于西安。

(宿凤林)

邵 乾 一

邵乾一(1874——1958)，又名邵尚勤，1874年生于辽宁省金县城内一个小商人家庭。邵家祖籍云南，其父亲邵云福携家逃荒至金县安家，家境较好，开设了天兴福食杂店。邵云福为人忠诚热情，曾担任金县商会会长多年。

在兄弟五人中，邵乾一排行第四，虽聪明过人，但不喜读书而嗜好习商，读私塾时，经常逃学回家到柜台上偷学生意经。父亲只得让他弃学到柜台上帮忙。他习商钻研，又有独创，深得父亲偏爱。18岁正式入号学生意，不到一年已样样精通，开始协助老父经营起杂货店。

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期间，金县地处战争之地，天兴福杂货店趁机为军队买办物品，获利很多，战争结束后扩展为中型杂货店。这一年，邵云福病故，家业由三兄邵子良和邵乾一共同主持。邵乾一不甘守家待业，主动要求三兄坐镇金县，自己跑外柜扩充业务。当时道路上匪患很多，有时他冒着生命危险奔波，几年间走遍辽南，探询商情，采办货物，

生意越来越兴旺。中东铁路通车后，金县商业突然兴隆，在他的建议下，天兴福由经营传统的日农杂货转为经营洋货，又获丰厚利润。

日俄战争后，大连港开放，中外商人云集。邵乾一抓住时机，于1906年到大连开设了天兴福杂货店支店。他在大连主持营业期间，与中外客户交往很多，很快学得一些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经营思想也有了转变。决定改弦易辙，由商转工，以商养工。鉴于当时大连没有机器制油厂，而豆饼豆油销售很快。于是1907年在大连报领了地号，开始兴建机器油坊。1908年天兴福油坊正式投产，日产豆饼200余块，当年即获厚利，以后又几次扩大厂房，增添改进设备，成为日产豆饼3000余块的大型机器油坊。并且在长春开办了天兴福粮栈，作为采购油坊原料的基地。与此同时，天兴福继续扩大商业业务，经营范围扩展到上海等地。

1914年邵子良病故，天兴福由邵乾一主持，五弟邵慎亭协助。趁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外国大量从东北采购粮食之机，邵乾一不断扩充买卖粮食业务，在黑龙江、吉林两省铁路沿线设立了多处粮栈，大做粮食投机买卖。同时将投资转向制粉业，1917年在长春兴建了天兴福制粉厂，8个月后即建成投产，日产面粉2000袋，面粉商标为“天官”牌。为增强竞争能力，第二年又增设生产设备，日产达到3800袋。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20年在哈尔滨香坊兴建了天兴福第二制粉厂，日产面粉6500袋，为整个东北地区产量最高的制粉企业；1922年在辽宁开原开办了天兴福第三制粉厂，1923年在海参崴开办了天兴东制粉厂，在哈尔滨顾乡开办了福兴恒制粉厂（后改为天兴福第二制粉厂支厂）。此外，又在大连

新建了天兴福第二制油厂。此时邵家事业达到顶峰，1924年初，整个家族拥有800万元不动产，200万元流动资金，成为拥有千万元资产的邵氏资本集团，在东北地区独家资本中居于首位。

然而，邵氏资本的发展触犯了日本财团在东北的经济利益，再加上邵乾一生性固执、刚强，有民族感，因此日本人对她十分忌恨，便极力拉拢老五邵慎亭。在邵慎亭的鼓动下，3个长兄的子女纷纷要求分家。此时由于种种原因，天兴福第三制粉厂和天兴东制粉厂又相继废业。1924年末，邵氏家族在外扰内乱中终于分裂。邵乾一分得天兴福第一制粉厂，不久该厂又由于侄子管理不慎失火，损失惨重。

邵乾一受此打击没有气馁，1926年，在哈尔滨道外新建了天兴福第四制粉厂，日产面粉4200袋；1928年又兑入哈尔滨香坊的日满制粉厂，改为天兴福第四制粉厂支厂，日产面粉5400袋；两厂日产面粉近万袋。就在邵乾一重振事业之时，“九一八”事变爆发，打破了他的梦幻。

在日寇的残酷殖民统治下，天兴福第四制粉厂只能维持经营。1940年，天兴福第四制粉厂支厂被日满政府以整理制粉业为名拆除。在整个日伪统治期间，天兴福第四制粉厂接受政府的公债、股票、储蓄、国防现金及汉奸、特务敲诈勒索等项目的支出，就高达47万余元，相当于整个企业资产净值的百分之五十。邵乾一深具民族气节，他从来不受日本财团和日伪政府的约束，并要求自己的子女不准与日伪人员往来，不准到日伪政府作官干事。他鄙视五弟邵慎亭甘为日本人效劳的做法，兄弟俩长期不说话。光复前夕，他对日伪的欺压凌辱行为无可忍受，愤然扔下企业回辽宁金县家乡休

养。

邵乾一平生遇事果断，近乎于独断专行。在企业经营管理方面，肯于钻研创新，有许多独特的经营方法。特别在用人方面，敢于大胆使用人才和培养人才，一贯以才取人，爱才如金，从来不分亲疏。

邵乾一平时专心致志经营事业，不结交官场。哈尔滨、长春、大连等地商会多次推举他任职，都被他拒绝，其它社会职务就更不理睬。他身为巨富，却俭朴如贫，所穿衣物都是自家缝制，规定家餐早、晚必须是粗粮。他经常乘火车来往于大连、金县、哈尔滨之间，从来都是买三等车票。但在赈困济贫方面，从不吝惜。伪满期间金县家乡受灾，他发去10余车皮粮食低价发售；哈尔滨修建文庙、极乐寺等，都慷慨解囊；开医院、办学堂，都乐于资助。

“光复”初期，大连地区交通断绝，金县又发生粮荒。邵乾一出头组织人力、财力，由水路赴朝鲜邻近地区运回许多粮食，解决了燃眉之急。为此，中共地下党组织送给他一个奖状，称他为“开明绅士”。

1948年末，邵乾一又回到哈尔滨，当时天兴福第四制粉厂已经恢复了生产，企业的生产和劳资关系等方面发生了很大变化。1953年他已近80高龄，正式退厂回辽宁金县养老。1955年7月1日，天兴福第四制粉厂走上了公私合营的康庄大道。1957年他从金县返哈尔滨参观了新生的公私合营天兴福第四制粉厂，并鼓励后代好好为人民服务，积极参加国家经济建设。1958年邵乾一在辽宁金县因病去世，终年84岁。

（赵世杰）

荣孟枚

荣孟枚（1878——1946），本名胡荣选，字叔右，晚年自号竹竿老人，满洲正黄旗人。荣孟枚光绪四年春生于阿城县，祖父华沙布、父亲胡凤山（亦叫凤子奇）皆以军功获清廷诰封。胡凤山共有3子，荣孟枚居长。

荣孟枚自幼聪颖明敏，少负诗名；23岁乡试中秀才，28岁时作为清政府派出的官费留学生入日本东京法政大学学习。留学期间，他与中国近代史上一些有名的人物如汤化龙、林长民等结识。1909年他从日本毕业归国后，应清廷学部试，得法政科举人；1911年春，殿试一等，授主事衔，官阶为正六品；旋即赴苏州，在江苏布政使陆钟奇署中任职。中华民国时期，荣先后任过江苏巡抚署秘书、黑龙江都督府参事、驻京奉军总司令部秘书、吉林督军秘书、吉林边防副司令长官公署及省政府秘书、中央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奉天法政专门学校教授、营口商业学校监督等职。

荣孟枚一生经历复杂，交游广泛，多有著述，是个诗书画俱佳、“名动公卿”的风流才子，又是一名热衷仕途的“名士”。他留心政治经济，写过一些令人倾倒的“砭时高论”，如《宪法论》、《国家学》等。也曾放浪形骸，混迹于“笔花场中”，写下了许多红香翠软的文字，如《佛桑馆诗文廿卷》、《挽联集》、《延春室诗话选》等。

在文学上，荣孟枚可以称得上是位才情洋溢的诗人，他的格律诗和联语都写的很有特色。他的作品，除开那些官场上的应酬之作外，大都能摒弃时文，不饰雕琢，而且三教九流，诸子百家，远典近俗，信手入诗，往往一经润镌，便能